

中華的中醫和我談到關於感染症的問題，話題逐漸轉到香港腳的議題，當談到香港腳的根治方法時，那位中醫鄭重地向我宣布：「在傳統的中醫裡沒有細菌這種東西！所以香港腳談不上根治黴菌。」這使我又更不懂中醫了，我想起兩件事，一是在慕尼黑文德教授處遇到的那位中國大陸來的鄭金生先生講的話（請參照第二三七頁），另一個則是何曼德院士在《康健》雜誌記者會時提起的問題。

何院士在一次代表衛生署參加《康健》雜誌社舉辦的記者會時提出了一個問題，會上有位張姓中醫師，據說他有一份民意調查的結果，這份民意調查是眾中醫師運用中醫治療最拿手的「病症」種類表。何院士聽了，馬上請張先生給他看那三十種病是什麼病，結果何院士一看，馬上說：「這三十種不是病，是症狀！」原來那表上列的是咳嗽、頭痛、經痛等，都是症候。何院士再追問，病人咳嗽最重要的問題在他是否感冒或肺癌，如果不追究原因的話，就算症狀好了也只是暫時的。

中醫的研究，我覺得愈是坎坷，並不是退休的人做的，何況我本來的興趣不在中醫，所以我深覺這是走不下去的一條路。我照實地說給何曼德院士聽，何院士當時是臨床研究組的主任，他說我可以選擇任何題目做。我把放棄中醫研究的事也告訴了吳成文院長，也經過了他的同意。

## ——國衛院的建築設計——

我在國衛院的另一個任務是設計與建造其永久設施，這項計畫經過我主持的會議，選了許常吉建築師與美國NBBJ的團隊來負責。NBBJ是本部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Columbus, Ohio）的一家建築商，在台灣因為曾蓋過和信等醫院而出名。

我們給NBBJ的安德遜先生（Mr. Anderson）的設計原則是這樣的：第一、國衛院的建築物應成為該地區的地標，不必再標任何字，就像美國西岸的沙克研究院（Salk Institute）一樣，以設計取勝。第二、國衛院的研究題目涵蓋很廣，所以設計外型應代表將來性、科學性、國際性及人文性。第三、國衛院應稍有本土化的象徵。除此之外，期間的過程我完全任憑NBBJ的建築品味及特色自由發揮，NBBJ過去的作品創意不少，而尤其對許常吉來講，NBBJ的參與無疑地將帶給許先生事務所新的突破。

我爲了這個計畫的成功，曾親自前往俄亥俄州哥倫布市一趟，看了該公司的產品。其中他們帶我去看他們爲保險公司（Nationwide）所蓋的巨蛋，那真是嘆爲觀止的一座建築物，我們台北的小巨

蛋只能說是該建築物的袖珍版。在俄亥俄州的巨蛋不只可大可小，並有二個滑冰的設備，只是不能舉行棒球比賽而已。

但我必須強調，設計歸設計，施工又是另外一回事，台灣的公家機關尤其容易受這個害，這和採購方法以及底價壓低有重要關係，成大的經驗是活生生的例子。我上文已經說過，在此不再陳述。

我雖然每次都與遠道從美國來的NBBJ在國衛院開會討論，而這些會議都是由我主持，但事實上我沒經手的部分也蠻多的。這要歸功於當時國衛院的主任秘書于重元先生以及全體的工務室人員，因為建築物牽涉的實在太廣了。

國衛院現已建築完成且已搬遷完畢，當年提出的重點大約都能遵守而實現，第一、國衛院的造型的確能為苗栗縣的地標，它雖不是沙克研究院的翻版，但充分利用了建地的地勢，國衛院面對的是一個平原，與沙克研究所面對的太平洋東岸有所不同。第二、國衛院的建築物的確涵蓋了我們所提出的條件，即將來性、科學性、國際性及人文性等，尤其是將來性與科學性最能滿足我們的要求。第三、NBBJ以不同顏色的迴廊來強調該院周遭的客家味，發揮了其設計時的本土化目

的，是極聰明的設計，象徵了騎樓的感覺。國衛院建造完成在竹南科學園區的一角，雖有少數的宿舍設備，但顯然不敷使用，國衛院於是發展了一個通勤的計畫；不是每一個在國衛院工作的人都有宿舍可住，有的人住在台北，利用這通勤計畫可從台北上下班，但解決這個困局，尚有待將來增建的經費。

## ——國衛院的院徽——

國衛院的另一個明顯的弱點是它的院徽（LOGO），不曉得為什麼，台灣人提到有關醫學機關，只能在綠色或不同顏色的十字打轉。我要的國衛院院徽是國際性的，而且象徵性很強，避免通俗，字則愈少愈好。這時我想到的是以台北為中心的奧美識別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的謝禎舜先生，奧美的前身是英國的公司，據我的瞭解，該公司似曾設計過可口可樂、凱悅、美國運通公司的標誌，是國際聞名的公司，不是隨便的。我與謝先生已在設計實健的標誌時，經實健的李先生引薦而有過面識。

國衛院院徽註解如下：

國家衛生研究院是國家專門從事醫學及衛生的最高研究機構，除了必須具備專業的技術能力及豐富的學識，更需要有積極入世的熱情及愛心。

國衛院的識別基石——組織標章即是以「知識」與「熱情」為核心概念，火焰代表知識和它帶來的力量，枝葉代表的是生生不息的愛心；樹葉的形狀採用銀杏，銀杏原產中國，而且自古就是代表中藥的一劑或健康，用以隱含東方的醫學精神。火和銀杏葉的背景是NHRI的縮寫，凸顯於深藍的底色，深藍色象徵著深厚的根柢及嚴謹的態度，整體的造型是一個盾牌的形狀，有衛護人民健康之意。



於是我經過吳院長的同意，請了謝先生來當時還在南港中央研究院院內的國衛院，謝先生與他的同事兩個人一起來院，仔細地傾聽了國衛院的簡報。謝先生到底還是來自不同凡響的一個標誌公司，他答應回公司後做幾件事：第一是要仔細地研究國衛院的使命及目標；第二是他要親自面談幾位國衛院的領導者；第三是他下次來國衛院時對院徽就會有所建議。至於價錢，我出面請謝先生盡量殺價，殺到國衛院不必使用正式採購的方法，那就是五十萬元以下。謝先生本來開價一百萬元，結果幾經折衝與交涉，最後以四十九萬元成交，我不諱言，這是我的功勞。

奧美公司不愧有它的專業性，他們經過兩次接觸後便能建議不錯的草圖，這是使人佩服的事。

這建議案經過何曼德院士及幾個國衛院領導圈子的人查驗以後，再經奧美的修正，遂成了現在的國衛院正式的院徽標誌，這是我很高興的一件事。

最近國衛院除了它的附屬單位，即疫苗製造中心以外，關於最後的裝修工作及公共藝術品的建造工作，我又被請去擔任這招標小組的召集人。老實說，我的意思是蓋在竹南的國衛院建築物本身既已成了苗栗的地標，就不必太多的公共藝術品來強調它的美，只要在大廳前及國際會議廳的走廊前稍再修飾即可，並不必絞盡心思去花大錢購置藝術品。但這仍舊是我個人的意見，並不代表國衛院的立場。

## ——何曼德院士——

何曼德院士幾乎可說是美國人，但他卻是道地的華人，我於一九六〇年代就因研究路線相似而略有認識，再次深入地認識他是我去國衛院當他的幕僚的時候。他的父親名叫何鳳山，是我國早期

的外交官，曾經擔任過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駐埃及全權公使及大使、駐墨西哥大使、駐玻利維亞及哥倫比亞大使等公職。他厚厚的一本回憶錄已經「自序」提過。

何曼德院士因此在奧國及柏林生活過數年，現在還能操德文，以德文做學術演講，德文比他差勁的我，還會與他交換過韓素英的書及數本德文書而互相學習過。根據他經驗得到的理論：小孩子學外語學得快但也忘得快，成人學外語較慢，但一旦學會就難忘掉。他小時候能講一口流利的土耳其語，但現在已經忘光了，是一個見證。我自己的客家話難道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

何院士在其回憶錄《我的教育、我的醫學之路》說，他在清華一年後，因為父親何鳳山接受了駐外的公職，問他要不要也到美國念書，因此，何院士就此到了美國哈佛大學的大學部就讀，念完了大學部也念完了哈佛的醫學院。醫學院畢業之後，他經由幾位科學界有名的人士帶領而進入了醫學領域的研究，以Monto Ho之英文名而出名，在三十五歲前就成功地得到了美國臨床醫學研究會會員的頭銜。

我一九六三年初到美國，常常在科學期刊上見到Monto Ho這名字，可見在一九六〇年代他已經研究有成。之後在國際干擾素會上常常遇到他，但他已經淡忘了我，因為我走上了不同的研究路

線，這次到國衛院算是重新認識了何院士。

對何院士來講，任何事都可探究而研究，在台灣期間，他對台灣的細菌對抗生素的抵抗力特別關心，另有引起他注意的是腸病毒的真相。何院士這些注意後來都受到監察院與衛生署的重視，他們因而都採取了一些行動。

何院士和我常在我及他的辦公室談天，對他來說倫理道德觀是很重要的，二〇〇四年總統大選我在電視上對兩位候選人所發問的教養問題，也是我在何院士辦公室談過的倫理問題，我們倆都嘆在實際戰場的政治人物是如何地不知政治、教育的道德觀念。

何院士現在已經從國衛院退休，長居匹茲堡，我曾到匹茲堡看過他。他的退休住所位於匹茲堡友誼谷(Friendship Village)的地方，裡面的設備相當好，但住進裡面的單位不能買斷，除了一筆不少的保證金外，不管住的是獨棟的房子還是公寓式的住所，另每月還得繳管理費數千美元，進駐時唯一的條件是住者能走路進去。管理費中一切生活的細工都包辦，包括換床單及清潔等，可謂退休生活極為舒適而容易。

一聲電話鈴響，台灣醫學教育品質的監測翻開了新的一頁。

這一通電話是教育部高教司當時的司長黃碧端教授，以陣前授命的方式，於一九九八年九月底打給已從成大醫學院院長卸任的我。電話內容是叫我率領兩人於當年的十月八日，代表台灣出席美國教育部在華府二十三街一家旅館舉行的外國醫學教育及評鑑委員會（NCFMA）的公聽會，並為該會所做對台灣醫學院評鑑制度的不利評價做一番答辯。這個使命交下來給我，連帶丟給我一些非先回答不可的問題：第一、美國教育部設立這麼一個委員會來調查各國醫學教育評鑑的原意何在？第二、如果答辯對我國仍舊不利，對我國醫學教育會有什麼後遺症？第三、我們已向該會提送的文件包括哪些？

可惜，教育部同仁似乎對這些問題瞭解不太徹底，對問題的焦點掌握不夠，更想不出有效的對策。這種問題的關鍵出在教育部裡懂得醫學教育的人著實不多，而懂得醫學教育又能冷眼觀察國際動態且能予正確分析的人少之又少。我於是去電紐約央求美國在華醫藥協進局的主席杜魯諾（Gerry Turino）博士代為蒐集有關情報，供我做惡補的參考。另一方面，我北上謁見黃司長，好讓黃司長能面授我機宜，並找出她所謂的兩位團員是何許英才。這第一個目的立即有了答案，她認為我應該帶慈濟醫學院當時的校長李明亮，以及台大醫院剛上任的李源德院長。

等了兩、三天後，杜魯諾博士有了消息，原來美國子弟想念醫學的太多，美國現有一百二十六所醫學院（美國所謂的醫學院只指醫學系，不像我們把有關醫、牙、護各系皆放在一個醫學院的屋簷下），容納不下所有這些子弟，名落孫山的子弟只好向國外另覓學醫的機會。於是在海外學醫的美國子弟遍佈全球，簡直是無孔不入，這和我們台灣有數千子弟在大陸學中、西醫的情況相差不遠。這些往海外求發展的美國子弟與在美國國內學醫的子弟一樣，都享有申請美國政府助學貸款的資格，但往國外跑的學生或因天資較差或其他未明原因，學成回國後考不取國考，因而拿不到執照的學生在比例上比國內學醫的美國畢業生高。學醫畢業卻考不過國考，國家就收不回助學貸款的國

庫支出，美國政府因此損失的金額一年約有兩千萬美元。這筆呆帳被美國國會逮住，要求教育部設立機制調查美國子弟所前往學習的各國的醫學教育品質。這調查令一下，美國教育部就組織了NCFMA請世界主要各國，包括台灣，向NCFMA提出資料，說明各該國的評鑑制度。評審結果分爲兩種，一爲該國的評鑑制度「與美國制度可相比」，另一爲「無法與美國制度相比」，換言之，前者是及格，後者是不及格，如果一個國家的評鑑制度被判爲不及格，則前往該國學習的美國學生將無資格申請助學貸款。

台灣有沒有美國的子弟來學習？答案是肯定的，這些學生絕大多數是移民美國的第二代台灣人，我主持成大醫學院就有過藍姓及黃姓兩位同學來自洛杉磯及蒙特婁學習的例子。

## ——答辯會上的挫敗——

瞭解答辯會的緣起到此，心裡的準備就有了頭緒，我們三人於當年十月七日晨抵達華府，台灣的答辯排在十月八日的早上約十點鐘，我事先約了李校長及李院長共進早餐，惜李源德院長住的旅

館遠在郊外，久候不見人，故只好我和李校長共謀說詞與推敲對策。答辯會是公聽會，所以有許多空位讓聽眾旁聽，委員會是各地醫學院的教育家，一共有十三名之多，主席是阿拉巴馬伯明罕校區的醫學院院長威廉·第爾博士。我代表台灣上答辯席之前是波蘭的代表，只見他回答了委員們幾個簡單的問題後，就有委員舉手提出動議，波蘭被判爲有與美國相比的評鑑制度，波蘭代表於是滿面春風地步出會場，接著我就被請上發言席而交鋒開始。

一開始，就有一位委員問說：「台灣到底有九所還是十所醫學系？」按當時輔仁大學的醫學系尚未成立，故正確答案是十個醫學系。但這一問馬上揭露了國內這問題出在教育部送給美方的文件夾夾一些會議或活動記錄，國防醫學院因不受教育部管轄常礙於這些文件中，這會使審查委員摸不出頭緒。最大的敗筆在有些教育部的活動因爲經費來源不同而不包括屬於國防大學的國防醫學院醫學系，所以文件中有的紀錄有九所醫學系代表參加，有的則有十所參加，使不熟悉台灣內情的人有不少困惑。我常說我們判斷一個人的修養程度與做事的嚴謹度只能由其言行評斷，我國向美國提出的文件既然如此雜亂而前後矛盾，想到這會給聯邦教育部審查委員帶來怎樣的初步印象，我就一陣寒慄。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坐在那裡發言，幾乎是受一群虎頭蜂攻擊似的，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尤其是與國家政策有關的問題使我不得不連哄帶騙。試問當別人問你：「你們以一試定江山的方式收進醫學系學生，卻沒經過面談，怎麼斷定他能做一個良醫？」請問讀者我該怎麼回答？我只能說我們已經認識了這一點，政府已經有甄試這一個管道，讓學生通過面談才能進入醫學系，這種學生的比例會年年增加。我對委員們對我國沒有常設獨立而公正的醫學系評鑑機構則無法招架，另外一個我幾乎無言以對的棘手問題是「我國怎麼不以國考的通過率做評鑑一所學校的指標？」我國國考題庫裡的題目品質我是瞭如指掌的，醫學教育的理念應是在解決醫療現場的問題，但國內的考題卻只著重在哲理上的探究，這是完全背道而馳的，此點上文也已經觸及，不再贅述。但這個問題，教我如何辯解？我正坐在那裡發言與委員們舌戰，只見一位委員舉手向主席提一動議，判定台灣的醫學系評鑑制度與美國無法相比，換言之，是不及格。因另有人立即附議，主席就接受這動議，付委員會投票，以全票通過讓我們繳羽。

回國後我立即寫了一篇詳細的報告，分析了這趟答辯敗陣的原因，除了黃司長外，不知教育部有誰仔細地評估過教部交給我的這使命得失？我自己的心底是有萬分不甘，我素來很少打事先就

知道打不贏的仗，非我能力所及的事，我也不會輕諾，因為我的座右銘是「不想走完不起程」(Go all the way, or don't go at all)。因此這次是徹底地繳羽而歸，頹喪的心，讀者當可瞭解。但事到一敗塗地的時候，人愈需冷靜地思考，免得影響邏輯演繹；我國被美國否定了評鑑制度，後果嚴重嗎？從表面來看，直接的後果是不嚴重的，頂多是美國籍的子弟來台灣學醫拿不到美國的獎助學金而已，那是他人的事，我們沒有任何損失。但把眼光再放遠，如果長期被國際上認為台灣醫學教育沒有良好的監測制度，就會改進不力，可能影響到國際間認為我國醫學教育不夠國際水準的可能性會愈大，甚至會大到影響我國醫學生或醫師欲往美國深造、修業、遊學都會受抵制的地步。說來說去美國還是世界醫學的王國，類似上述的抵制，將會使我國的醫學墮乎其後，這會不符台灣居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值得省思的是台灣的醫學教育已保守許久，許多醫學教育的理念與措施已經幾乎落後美國至少二十年，而一試定江山式的醫學生招募方式更是利多於弊（請參閱拙著《生死關頭見豁達》），光是這一點，就值得我們重新省思與評估。故乘此次繳羽之恥，在國內掀起一陣醫學評鑑與改革的風潮，也不失為造福病人的莫大良機，塞翁失馬，就是借刀殺親，也在所不惜。

## 一起跑

我的上述最後一個結論並非憑空構思，而是有我個人的觀察基礎：第一、國人拭不去遠來的和尚會唸經的媚外惡習，老外說我們好，我們就借題發揮，老外說我們不行，國內就風吹草動。我們這個心理這次必須予以善加利用，嘉惠我們國人。第二、我國近來一直受中共各方的打壓而外交舞台漸漸縮小，由醫學教育切入打開一片舞台與諸國代表為伍，是一個新鮮的開拓工作。第三、醫學教育的改進應該不忘把廣大的病人群視為受益者。第四是疾病無國界，我們的醫學教育應該面對整個地球村，而不侷限於本土的小格局。

當年十一月底前，我寫了一詳細的醫學系評鑑制度建議書（以下簡稱醫評會），目的在設立一中立而公正，且永續性的評鑑制度。這建議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是成立規劃委員會進行規劃階段，舉凡組織規程、經費來源、評鑑程序、評鑑結果之報告和判定，以及醫評會與教育部之關係皆有詳細之考量。該計畫書提出後，教育部於該年十二月十六日召集全國醫學院之代表開了一討論會，並經該會一致通過本人所撰寫之計畫。規劃經費共三十多萬，由教育部提供，規劃委員會由我

作召集人，經由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吳成文同意，初期將醫評會暫厝於該院。規劃委員中有台大的黃伯超、謝博生、陽明的曾志朗、和信的黃達夫、成大的王乃三、國衛院的張仲明諸教授，以及阿拉巴馬大學伯明罕校區的醫學院院長詹姆士·彼得曼（James Pitman）等。規劃委員會的工作則因為經費的手續延後到翌年七月一日方起步。

在規劃委員還未開始工作前，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參加了台大舉辦的一次醫學教育評鑑會，會中有位澳洲醫學評鑑會（即Australian Medical Council）名為賴金（Larkin）的主席來當特別來賓，料想台大是想藉此取一些評鑑的經。我因為性急，雖然陰錯陽差，沒能見到他本人，但立即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給他，問他能不能發函邀請我參加下一次澳洲的醫學院評鑑。賴金博士立即回信說我可以國際觀察員身分參加一九九九年六月廿五日起一連五天，對於澳洲西部城市柏斯的西澳大學醫學院評鑑活動。澳洲評鑑醫學院的工作是由半官方的澳洲醫學委員會負責推行的，該次訪視係由東部昆士蘭大學醫學院的心理學教授賴瑞·蓋芬（Laurie Gelfen）帶隊。我雖然毛遂自薦自邀參加，但該會給了我所有參與該國團員同等的禮遇，給了我不少的學習機會，對該會來說該次評鑑是首次有國際觀察員參與的創舉。除了我之外，另有台大黃伯超及成大王乃三兩位院長亦遠赴美國訪問了不少醫



學院的評鑑，蒐集了不少資料。

規劃委員會的工作可以長話短說，我日以繼夜地寫完了評鑑手冊，這手冊裡包括醫評會的組織規程、評鑑程序、冗長的評鑑目的以及判斷標準。評鑑標準要顧及本國文化、社會體制，又要顧及世界潮流，並非容易的事，我是借鏡美國與衣鉢英國系統的澳洲做為範本所加以修正寫完付梓的，因此台灣醫學評鑑目的是美、澳、台灣醫學教育求卓越的大雜燴。我爲了寫這些文件，惹出太太的怨言，她認爲我主持成大計畫都沒這樣忙過，從成大退下來到台北搞醫評會這一計畫怎忙得談幾句話的時間都沒有了？但因我投下了心血，規劃委員也慷慨協助，規劃的工作如期完成，其中包括第二階段的實施計畫。我也親自與當時的教育部長楊朝祥開會，對未來的願景做了一次詳細的說明報告。

台灣的醫評會（TMAC）於是於二〇〇〇年的八月一日起跑，開始的一段工作由我的秘書王晶玉小姐及臨床研究組的李純恬小姐幫忙，而醫評會原本的組員艾宇凡小姐及朱宥樺先生則遲至當年九月才到任，醫評會訪視委員人才庫也迅速地膨脹到大約八十個名字，包括國外的知名醫學教授。



TMAC規劃委員會的工作團隊（左起依序王晶玉小姐、朱宥樺先生、艾宇凡小姐）。

我相信自台灣醫評會之成立，爲台灣所有既有的醫學系在教學的改進方面打了一劑強心針，世界衛生組織說健康是基本人權，所有支持醫評會的人都應以捍衛國民之基本人權者自任，醫評會也成了台灣高等教育評鑑制度試探的濫觴，許多不同學域的領導者皆紛紛來醫評會取經，教育部也仿醫評會的例子來提升各領域的教育活動的可能性。教育部在曾志朗部長任內製作的白皮書中，也把高等教育之評鑑列爲二十一世紀工作重點之一。

## 重返答辯

二〇〇一年年底，我仔細地蒐集了台灣進行醫學評鑑的經過，除了詳細的敘述以外，配以廿一件附件，其中附件第十二為台大醫學系之評鑑報告，一併送到美國教育部那曾讓我初嚐敗績的委員會，要求該委員會重新評估台灣的新制度。該委員會把台灣案列在二〇〇二年三月一日在華府公聽會上予以討論，這次我是有備而來的，我特請醫評委員之一的何曼德院士同行前往華府答辯，結果台灣案就像一九九八年我目睹的波蘭案子一般，輕易地過了關。台灣醫評的經過於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五日再由該會追蹤，委員會對我和同行的賴其萬教授如何厚待，讀者可參閱以下我於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刊登於中國時報的文章。這次台灣案審查的氣氛已完全吹走了一九九八年十月八日的楣氣。

二〇〇三年三月十九日，世界衛生組織的外國組織世界醫學教育聯盟於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我在該會發表演說，分析了台灣醫評會初步成功的重要因素：第一、台灣有一批真正為台灣醫學獻身的醫界人士；第二、醫評會的規劃委員引進了外國醫學教育的優點並予以本土化；第三、國

家衛生研究院的慷慨協助使醫評會初期有了家，以保獨立於教育部的形象，並且借用了國家衛生研究院多年來建立的學術專業性與公正性；第四、依照醫評會規劃，訪視小組必有國外專家兩人參與；第五、訪視結果與校方申訴皆原文不動地上網供全國國民參考，為考生選校考慮之用；第六、批評一所學校必須根據確切的事實與數據。

回過頭一看，我為台灣醫學教育評鑑催生的仗並沒完全打輸，而且經過這次驚濤駭浪，我們已贏得了美國教育部以及世界醫學聯盟的不少朋友。

教育部原本即計畫，TMAC若能順利成功，即開始積極推動籌劃設立獨立之高等教育評鑑專責機構，將TMAC的評鑑制度及經驗推廣至非醫學系之所有大專院校，賴以全面健全高等教育評鑑制度，提升國內高等教育品質。因此，有鑑於TMAC的成功經驗，教育部已於二〇〇六年一月一日成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為獨立之評鑑專職機構，TMAC於該年乃脫離國衛院，正式遷入成為該中心之一部分，但仍維持其獨立運作之特性。



第四部

# 與寫作結緣

我不一樣的人生

|黃崑巖自傳|

## 龍應台與陳之藩

龍應台的名字很響亮，是我所尊敬的文學作家之一，她是成大出身，但我和她相識，另有原因。龍應台的兄弟姊妹也不少，高雄就有一位她的弟弟叫龍佛衛，是位精神科醫師，但也懂得如何運用針灸；他的夫人是成大醫學院護理系的老師，名叫徐畢卿，現任成大的學務長。

我很羨慕龍應台等人瀟灑的文章，這種文章只有分析能力特別犀利且知識豐富，尤其是國學基礎雄厚的人才寫得出來，我遠遠地落後在這一票人的後面。有人反駁我說我想說的和她（他）們想說的內容不同，但如果我能寫一手流利而瀟灑的文章，則效果會如虎添翼。

我曾受她的青睞與邀請，到過清華漫談，與學生對話，龍應台命名此項節目曰：清華思想沙龍，而我當天的題目是：「如果重做大學生」。事後她也諸多讚賞，但我知道這是高尚的抬舉。有

一次她跟我說，我的名字已和教養連在一起了，表示我對教養的看法獨特又觸到了台灣現時社會問題的核心。

陳之藩先生也是我很尊敬的作家之一，他是道道地地的科學人，但人文素養很高。他不但寫漂亮的散文，他的作品，像龍應台的文章一般，言之有物，而且這「物」很多，不然他的文章不會在高中課本上出現。我之所言，與所欲言，比起他之所言是差多了，像是患了貧血症。

有一次他來成大醫學中心演講，題目觸及薛丁格(Schrodinger)一事，薛丁格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而他的書《什麼是生命？》(What is Life?)是他的代表作，據稱華生(Watson)和克立克(Crick)兩人也受了這本書的影響。

他曾經寫信給我，提起為什麼楊振寧與李政道兩人拿到了諾貝爾獎以後反目的問題，要我分析，我卻不敢回他的這封信，因為我覺得我無法和他對談，他的程度太高了。他與夫人童元方女士現在都住香港。

29

## 開始寫作

我寫書的動機，來自遠近兩因，但我作夢也沒想到在生涯的末期會有寫書的決心。

原來，《中華日報》有一位記者，在他有事沒事就找我麻煩前，我就寫了不少報告教育部及各報有關固定題目的短文。這些文章都經過了內人及我的幫手李美穎小姐的檢視，她們平常就常異口同聲地說我的點子不少，文章的重點也掌握得住，故經常鼓勵我寫文章。但我自己的感覺是我的國學基礎頗差，寫文章是免談了。龍應台、陳芝藩、李敖等人的文章都比我瀟灑，如果比起他們的文

章，我是在魚目混珠，最近的清華學苑的構想就是好例子。

話說台南的《中華日報》本來是全國性報紙，現在已經緊縮成地方報紙。《中華日報》我很少過目，不過在台南的發行量是相當可觀的，該報社有一記者對成大的進展特別關心，報導頗多，這

種行為本身並無可厚非，但其內容則語多扭曲。後來有一天，我秘書告訴我，曾眼見這位記者趁我不在辦公室，翻閱我桌上的文書，這我就火大了！因為我在回台南先就和夏校長當面講過，我是回來做事的，媒體就由他來應付，所以記者與報導員我是很少見面的。這位記者的行為嚴重地違背了新聞道德與我的原則，而且這位記者的意見已有擴散到各大報地方版之勢。

有一次我請來這位記者與李茂雄教授，會中我正面與記者衝突，使得李教授覺得有點局面無可收拾的感覺，這也歸因於我在台灣的經驗不太夠的關係，但壓倒這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於一九八八年六月到來。那時附設醫院於該月十二日先行運轉，我與內人晚上到六樓病房看看。六樓居然有一條寵物狗泰若自然地走來走去，料想是住院病人帶來的。我立即請了六樓的護理人員向病人及家屬說明這是不許可的現象，必須加以糾正。等這事情解決了之後，我就與內人到了急診處，急診處靠近入口的地方有長椅一張，我與內人坐下稍做休息，突然入口走進了上文提到的記者。

她看見我們馬上就問：「你們在此幹什麼？」我們說我們來看附設醫院的運轉情形，我內人反問她：「那妳呢？」她一臉驚訝的表情回說：「我也是啊，難道我不能進來嗎？」我內人心直口快，因為平常就常耳聞新聞記者的種種，在她工作的奇美醫院尤常成為話題，故說：「妳不能進

來，這裡是狗與記者不能進來的地方！」這台詞有點類似上海的黃埔公園入口處的標示，該標示明明白白地說此公園中國人與狗勿進，這時我知道禍已臨頭了！

回家不到半個鐘頭，夏校長出現在我家，說我們需要到該記者的家中道歉。我催促我內人前去，但我不去，因為話不是我說的，更因為這樣道歉會把我反對她的立場轉弱。但最後看在她立場難堪，故終究前往該記者家裡。從此她對我的事的報導有變本加厲的情況，凡是我的收入、我的座車，皆在她的報導事項之內，更遑論成醫工程的褒與貶。

後來有一天，《中華日報》副刊的總編輯吳涵碧突然打電話過來，邀請我替《中華日報》寫專欄。我與內人及李美穎商討，認為上述記者已經找我麻煩夠久，這次中華副刊特別邀請，表示我在《中華日報》並未被打倒，故接受這個邀請。於是我就打了電話給吳涵碧小姐，表示我願意為該報開闢一個專欄，名為「岫廬集」，這是我寫作的開始。我感謝內人的鼓勵之外，也感謝李秘書的從旁加油，以及《中華日報》吳小姐盛情邀約。

「岫廬集」一共寫了十年，一直到報社緊縮為止，中途匯集了六十篇左右，出版了一本書叫《莫札特與凱子外交》，這本書是《中華日報》出版的，出版日期是民國八十七年二月。到目前為

止，我曾寫了《中華日報》的專欄，因而又替《康健》雜誌及《聯合報》寫了專欄，並且出了約十本書，其中《黃崑巖談教養》及《給青年學生的十封信》二書特別受到讀者的歡迎。

30

## 談教養

《黃崑巖談教養》這本書的出版是自己沒有料到的事：二〇〇四年二月十四日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的總統候選人辯論會，據籌備那場辯論會的機關相傳，我的名字被舉為可能代表教育界向辯論的兩人發問時，沒有人反對，故輕易通過。這也難怪，因為沒有人能指我而標以藍或綠。那時台灣對辯論還是生疏，發問人有兩輪機會各向兩候選人發問，每次發問有四十秒鐘的時間，在舞台的底部有一電子鐘在控制，觀眾是看不見的。發問人中除我代表教育界以外，另有代表經濟界、法律界、政治界等四個人，這些人要問什麼問題有充分的自由，而且每一個發問人之間並無互通之事，到了上台前十五分鐘才打開問題。我記得我要問教養的問題，代表經濟界的朱敬一院士就說：「今天最難的問題就是黃教授提出的有關教養的問題。」辯論的結果，有關教養的問題連戰似乎佔

了上風，但兩個人都答得不完整。

過了兩天，聯經出版公司前發行人劉國瑞先生、發行人林載爵先生、擔任主編的林芳瑜小姐，來找我吃飯，並說教養的問題是我們社會的問題，兩位候選人都對這個問題答得不好，問我能不能寫一本書來解釋？經一陣折衝之後，我一口答應下來，並兩個月就把它完成。我在序當中是這樣說的：

「柏林大學的創辦人洪保德（Wilhelm von Humboldt）是極端重視教養的人。哥德一八三二年逝世被認為是德國古典時代的終結，而洪保德大約也是和哥德同期的人，僅晚逝前者三年，這兩個人對德國人的教育與社會之重視教養，發揮了很深遠的影響。我很尊敬的朋友何曼德，曾追隨著外交官的父親待過不少地方，也受過不同文化的薰陶，對德國文化有獨特的閱歷。他認為德國人是個人教養境界很高的民族，講到教養，就非提德國不可。依洪保德的看法，教養是值得我們傾力追逐具備在身的資產，是精神內涵很高的境界。追逐的自然結果是個人的提昇，個人的提昇會導致社會的優質化，因為社會是由人所組成的共同體。

在過去封建的社會裡，兒子多半繼承父業，平均壽命也不長，一般人很少有考慮一輩子要過何

種工作或過何種目的為主軸的生活的餘暇與空間。但現在不同了，社會比以前多複雜了不知多少，活在人間的時間也增長了許多。雖然傳統繼承家業的觀念或許未被拭盡，個人為主的思維方式已儼然成了生活的中心目標，幾乎每一個人都有為自己過何種生活、追尋何種目標、抱何種人生觀，並為這目標打下基礎，作深入思考與探究的機會。這被認為是追尋教養的起源。

教育如果辦得好，可以增強個人思維的能力，點出思考的正確方向。如果教育成功、內涵又正確，它會為社會上增加能辨識是非，讓理智與道理控制行為的人，社會就會更合乎人性，和諧與安祥。如果教育沉淪到只偏重就業，甚且走極端的學以致用而講求生存的競爭力，忽略了藏在生活基座的文化面，或失去改善生活的功能，逐漸成為訓練技能的工具，那麼教養的價值在社會也會全面滑落，人成為錢財與情緒的奴隸而為非作歹，談不上國民所企求的安居與樂業。

教養卻是難予捉摸的概念，值得大家的省思，它具有許多面具，會在我們不經意時露面讓你恍然它的用處。本書的目的就是在探究教養的這些不同面具，如果它有助於讀者了解教養無形的影響以及它在做人方面的必要性，我們的社會會有不同的明天。」

出版一本書的經驗是很特殊的，但不管我如何成功地出版了一本書，國學基礎的缺乏，我認為